

##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费孝通

近些年来我常讲“文化自觉”问题，具体的采用这个名词是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层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我提出这四个字“文化自觉”来标明这个研讨班的目的，我想总结一下，问一问，我们在这个研讨会上大家在做什么？这四个字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

这个名词确实是我在这个班上作闭幕发言中冒出来的，但是思想的来源，可以追溯的历史相当长了，我想大家都了解自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上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我们所熟悉的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中。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在燕京大学上本科时，曾选修历史系一位外籍教授开的“中国文艺复兴”的这一课程。他的教法是把清朝末年、1860年、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以后到辛亥革命期间，他把他看到的外国作者对中国人的事情和说法的英文材料让我们阅读，以了解这段历史的变化。对这门课我是很用功的，他指定的书和文章我都读了，而且记录下来。所读的材料，历时约50年间，经过4个皇帝，进犯的国家从老牌的英、法、俄开始，逐渐增加到12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有十几个之多。这段时间里还有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黄花岗起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有一件事对我印象很深，至今仍然记得。那就是在太平天国宣布起义并定都南京后，有一位曾国藩手下的大将，名叫胡林翼，当时驻守在今天安徽的马鞍山，他在阅兵时，有一只外国军舰，冲着他沿江而上，这位大将竟当场昏厥了过去。以后别人问他为什么，它的回答是对付太平天国我们还有把握，但对付这些外国军舰就没有办法了。此事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清政府上层的态度。他们看到了中国的物质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因而惧怕和退缩了，从而引起了以后丧权辱国的灾难性后果。

这说明在中西文化碰头时，他们认输了。这是一个大转折。过去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使节为“外夷入觐”，乾隆皇帝认为自己国家物产丰盈，并不需要“外夷”的货物，和他们贸易只是一种恩赐。英国使团提出觐见时，曾要求英使节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这个皇帝这时还没有认输。

中西文化碰了头，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就一直是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的社会变迁，争论不休，可以说至今还在继续中。在“五四”运动以前，大致上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已有了“西学”的观念，要在技术上学习西方人的长处，以求有所改进，可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看法来概括。人们对中国原有一套政治伦理秩序并没有发生大的动摇。到了“五四”运动，碰到的问题已不是借用一些“西学”可以解决的了，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的旧文化了。所以“五四”运动又叫新文化运动。不



少人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观念作为推翻和取代传统制度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与科学，在“五四”之后发生过“科学和玄学”及“民主与独裁”的两次重要争辩。随后中国共产党在 1921 年成立，马克思主义得到不少青年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是知识界不能回避的问题了。抗战开始，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使争论暂时停顿下来，但战后应该建立怎样一种社会文化秩序，仍然是知识界关心的主题。彻底打破现状，重建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无疑对于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那时主导的思潮是否定传统的，当时即使有人提醒人们应正视革新和传统的关系，也并不能引人注目。抗战结束后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情况也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而迅速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知识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上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归结起来看，无论是“戊戌”的维新变法，“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和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了起来，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了“现代化”的敌人。“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顶点，要把传统的东西统统扫清，使人们认为中国文化这套旧东西都没有了。

总之，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步履维艰。怎样才能使中国文化的发展摆脱困境，适应于时代潮流，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以探求中国文化的道路。由此涌现出各种流派，有如新儒家就是重要的一家，它主要在哲学一门之内，也涉及到史学，看法未必一致。这方面我不太熟悉，最近看到余英时先生的文章讲到：以“新儒家”的名是指 20 世纪的思想流派，其事起于海外，特别指 1958 年元旦张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四位先生在香港《民主评论》上所发表的一篇宣言——《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这些情况以及其后之发展在我当时的处境自然不会了解，同时也不会是大陆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问题。现在应该回过头来看一看，作一番研究是有必要的。

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开始有所反思，我们要搞清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不可能割断历史的，港台的知识界 60 年代也对此提出了问题，不少人感兴趣的是怎样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找到接榫之处。说明文化不仅仅是“除旧开新”而且也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现代化”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另一方面也同时继续并更新了“传统”。

就我个人来说，我受到的教育是从清末民初所谓新学开始的，这个新的学校制度是针对旧的科举制度下的私塾制度而兴起的。我的父亲是最后一科的秀才，科举制度在他那一代取消了。改革之后，他被选送到日本去留学，学教育。回来后就搞新学，办了一个中学。我母亲创办了县里第一个蒙养院，我从小就是在这个蒙养院里边长大的，所以我没有进过私塾，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教育。连《三字经》、《百家姓》也没有念过。我念的是“人、手、足、刀、尺”，是商务印书馆的小学课本，是新学的东西。不用面壁背书、坐冷板凳，还可以唱歌做游戏。初小后进入私人办的私学，也是由留学生办的新学。接着上了教会办的大学，从东吴转到燕京，又进了清华研究院，再去英国留学，一生受的教育都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新学”教育。父母主张新学，不要旧的一套，在儿女身上不进行旧式的教育。所以我缺少了从小接受国学教育这一段，国学的根子在我身上并不深。中西方文化接触过程中，在我本人并没有感到严重的矛盾。这一点和我的上一代是不同的，他们是受中国文化培养成长的，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由于他们基本上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而对中国文化的长处有亲切的体验，甚至有归属感。所以他们的基本立场是“要吸收西方新的文化而不失故我的认同”。如陈寅恪先生讲“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钱穆先生说“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像他们这样的学者是无法接受“进步”和“落后”的简单二分法的，



他们求新而不肯弃旧，这在当时的潮流中不免陷入严重的矛盾之中。

我在 70 岁时重新开始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进入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当时预计还有 10 年的工作时间，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为中国的人文社会发展多做些工作。我学习社会学、人类学的基本态度就是“从实求知”，首先对于自己的乡土文化要有所认识，认识不是为了保守它，重要的是为了改造它，正所谓“推陈出新”。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80 年代末我去内蒙古鄂伦春族聚居地区考察，这个民族是个长期在森林中生存的民族，世代代传下了一套适合于林区环境的文化，以从事狩猎和饲养鹿为生。近百年来由于森林的日益砍伐，威胁到了这个现在只有几千人的小民族的生存。90 年代末我在黑龙江又考察了另一个只有几千人、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存在的问题是同样的。中国 10 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就有 22 个，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他们如何长期生存下去？特别是跨入信息社会后，文化变得那么快，他们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我认为他们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要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说“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我回想起在上世纪末与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关于“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的对话。我提出了一些自己在思考的问题，并且认为研究文化的人应该注意和答复这些问题，譬如我们常常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这背后一定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可是这些文化特点是什么？怎么在起作用？我们都说不清楚。

我们交谈时涉及到了几个实例：一是谈到重视家庭的思想，注重家庭的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生产力一下子解放出来了。以后在农村工业化中，又看到了真正有活力的是家庭工业，同时让我进一步想到中国社会的生长能力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我想是在世代之间联系的认识上。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二是“一国两制”的实践不光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而在不同的东西能不能相容共处的问题，所以它还有文化的意义。这就是说中国文化骨子里还有这个东西可以把不同的东西凝合在一起，可以出现对立面的统一。三是“多元一体”的思想也是中国式文化的表现，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要能够从别人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中发现出美的地方，才能真正的“美人之美”，形成一个发自内心的，感情深处的认知和欣赏，而不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目的或一个什么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相互容纳，产生凝聚力，做到民族间和国家间的“和而不同”的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结合。四是要能够想到人家，不光想到自己，这是中国人际关系中一条很重要的东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我说的差序格局就出来了。这不是虚拟的东西，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实事，是从中国悠久的文化里边培养出来的精髓，文化大革命对这一套破坏得太厉害，把这些东西都否定了，我看这是不能否定的，实际上也否定不了。



我们现在对中国文化的本质还不能说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得很清楚，但是大体上说它确实是从中国人历来讲究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所指出的方向发展出来的。这里边一层一层都是几千年积聚下来经验性的东西，如果能用到现实的事情当中去，看来还是会发生积极作用的。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许多我们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疑难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把这些特点用现代语言更明确地表达出来，让大家懂得，变成一个普遍的信息和共识。

长期以来，在西方文化浪潮的冲击下，特别在“文革”时期，“传统”被冲刷得太厉害了，由此所造成的危害及其严重性还没有被人们所真正认识，同时能够把有深厚中国文化根底的老一代学者的学术遗产继承下来的队伍还没有形成，因此我深深感到知识界的责任重大。我前面谈到由于自知国学根底不深，需要补课，近年来读了陈寅恪、梁漱溟、钱穆等先生的著作，很有收获。启发我们对中国文化精神更深入的理解，对中西文化比较进行更深刻的研究。

同时自己感觉到对世界大潮流有些“隔膜”，虽然改革开放后我们已经重新“放眼看世界”，我也多次出国进行学术交流，但开始看到的主要是西方在新技术方面的迅速发展，有如我在《访美掠影》一书中描述的计算机信息技术等。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舆论“自鸣得意”，我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有批判，但对于中西文化中深层次的问题并不敏感。正如我前面所讲自己力争紧跟国内社会经济发展，“行行重行行”，提出“文化自觉”看法，也是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中看到的。

去年美国的“9.11事件”对我有很大的震动。在我看来这是对西方文化的又一个严重警告，而且事件后事态的发展令我很失望，这种“恐怖对恐怖”的做法，让我看到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里太轻视了文化精神的领域，不以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处理文化关系，这是很值得深刻反思的。因此也促使我想从理论上进一步搞清一些问题，如个人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问题等，以利推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

今年5月我在南京大学建立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发表了“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的讲话，进行了这方面的探讨。我们这些人，从生物基础上看是和其它动物一样的，它的生命实际上同样有一定的限期，即所谓有生必有死，生和死两端之间是他的生命期。但由于人们聚群而居，在群体中又凭其共同认识相互模仿别人的生活手段以维持他的生命，这时他才从“生物人”变成了“社会人”。每个生物人都在幼年逐步变成社会人而继续生活下去的。只有作为一个社会人，生物人生命得以绵延直至死亡。我们一般说人的生命是指“生物人”而言的，一般所说人的生活是指“社会人”的一生而言的。生活维持生命的继续，从生到死是一个生物必经的过程。但是生活却是从生物机体遗传下来的机能通过有向别人学习的能力而得到的生活方式。一个人从哺乳到死亡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是从同一群体的别人那里学习得来的。所学会的那一套生活方式和所利用的器具都是在他学习之前就已经固定和存在的。这一切是由同群人所提供的。这一切统统包括在我所说的人文世界之内。它们是具体的文化内容。当一个生物人离开母体后，就开始在社会中依靠着前人创造的人文世界获得生活。现存的人文世界是人从生物人变成社会人场合。这个人文世界应当说和人之初并存的，而且是历代社会人共同的集体创作，社会人一点一滴地在生活中积累经验，而从互相学习中成为群体公有的生活依靠、公共的资产。孔子说：“学而时习之”，就是指模仿别人而不断实践。这是人从作为生物个体变成社会成员的过程。

人文世界拆开来看，每一个成分都是社会中的个人凭其天生的资质中创造出来的，日积月累，一代代人在与自然打交道中形成的。这些创新一旦为群体所接受，就进入人文世界的内涵，



不再属于任何的个体了。这就是我们应当深入理解的文化社会性。

文化是人为的，但这里只指文化原件的初创阶段，它是依靠被吸收在群体中的人们所共同接受才能在群体中维持下去。一群社会人相互学习利用那些人文世界的设施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或说包括它的硬件和软件，进行生活。因而群体中个别生物人的死亡并不一定跟着已有文化零部件的存亡，生物人逃不掉生死大关，但属于社会人的生活用具和行为方式即文化的零部件可以不跟着个别生物人的生死而存亡。文化的社会性利用社会继替的差序格局，即生物人生命的参差不齐，使它可以超脱生物体生死的定律，而有其自己存亡兴废的历史规律。这是人文世界即文化的历史性。

强调重新更深入地认识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文化的认识。我已注意到文化价值观方面存在着东西文化的差别，中华文化的传统在出发点上和西方文化就有分歧。前一辈的学者，所谓新儒家，已经碰到了这个问题，他们用历史学的方法，做了具体而细致的研究工作，钻研得很深，提出了他们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真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并能与西方文化作比较，必须回到历史研究里边去，下大功夫，把上一代学者已有的成就继承下来。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边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现在能够做这件事的学者队伍还需要培养，从现在起在几十年里边培养这样一批人是一件当前很重要的事情。当务之急是要在我们的知识界造成一种良好的风气。补上“放眼世界”者一课，关注世界大潮流的发展变化，我自己年纪大了，实际上不能进一步去观察，也没有条件深入研究了。但我认为经济全球化后文化接触中的大波动必然会到来，迟早要发生的，我们要有准备地迎接这场世界性文化大论争。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了解和认识这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

以上这些初步的不成熟的见解，作为自己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来的自白，以供同人们批评指正。

(本文为作者 2002 年 8 月 6 日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 【专题论文】

# 试论语言社会学在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马戎

**摘要：**当前世界各国大多属于多族群国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工具，语言对于研究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有着特殊的价值。在不同族群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语言、方言的差别，影响甚至制约着区域间、族群间的交流与发展。因此对于各地区、各族群在语言、词汇的使用与演变开展研究，应成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关注领域。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和探讨如何从语言使用调查入手来分析区域之间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社会融合、从语言词汇使用的变化情况分析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通过借鉴国外相关理论与

